

从土生华人到老归侨(中)

萧群

影响到我不能跟中国学生一样入团入党;考大学选择自愿时,我爸爸主张我报工科,于是我报考了天津大学化工系无机专业。1965年毕业时,我已经习惯在中国的生活,不想回印尼了。我爸爸也同意了。但有关领导却动员我回印尼去。于是,我就回到印尼,却不料回家还不到一个月,印尼“九·三〇事件”便发生了。我爸爸被捕,家里被抄,到处抓人杀人。为了不暴露身份,我不得不在日新学校教书,一直到了1966年该校被封。年底我再次踏上轮船,辗转回到中国。可当时,国内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处都在闹革命,很难找到管我们的人。

终于,领导征求我意见,想去哪里工作,我不假思索就说到工厂。于是我被分配到北京化工实验厂,从工人,技术员,调度员一直干到高工。在此期间,为了不暴露我的身份,我到公安局改国籍,正式加入中国籍,把名字从萧美兰改成萧群。

在工厂一年后转正,工资从45元涨到55元。虽然我还得负担在华侨农场的弟弟,每月给他20元,但还积极响应节约主动要求调低工资。当时在厂里,革委会、军代表是最

高领导。我已经是中国籍了,应该可以入党了吧?在厂内的各种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什么事都严格要求,起带头作用,可是,因海外关系,以及中国与印尼断交等原因,我的入党问题直到刘延东同志当我们车间书记时,才得到解决。此后,到了36岁我才结婚

我在家是老大,却没能让父母省心过。1966年前我们前4个孩子都在中国念书。老二萧美丽、老三萧忠清是以留学生身份来的。萧忠清1965年进的清华大学,可又遇上“文化大革命”,没学到东西,打算回印尼,后来却只能滞留在香港。老四萧忠贤印尼排华反华后1966年来华,先在广州,后来来到海南农场割胶,身体顶不住,吐血查不到原因。20世纪70年代初,他进了北京医学院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人疗养院工作,后又调到广州。爸爸1981年在荷兰去世时,他去奔丧,以陪同妈妈为由,就留在了荷兰,和萧美丽一起行医,维持家里生活,照顾我妈妈。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我,无论在哪里都受到周围朋友的无私帮助。我有心回报社会,也乐于帮助别人,但不一定能回报曾经帮

助过我的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革命大家庭。

“文革”后各级侨联组织恢复,我于1989年又被调到北京市侨联联络部工作。当时侨联很穷,要开展什么活动都要自己想办法筹钱。从来没做过生意的我,为了有钱搞活动,联络部还卖过蜂王浆,一瓶赚一毛钱我们也干,后来帮印尼归侨回印尼探亲,协助办理签证,我们得以收取些服务费。不少归侨来北京市侨联,是因为知道我是萧玉灿的女儿,相信我。从中我也结识了不少可贵可亲的归侨。来京探亲遇到问题的华人,也会经常到侨联找我。比如,得了重病,上飞机需要更好的服务,推轮椅送到候机室;住院找合适的大夫看病;来京需要接机,语言需要翻译沟通,等等。总之,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都尽力做到热情服务。因为服务,我们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因为服务,我们彼此产生了信任,结成了友谊;因为服务,北京市侨联得到银闸胡同400平米的独门独院平房,建立“归侨之家”;因为服务,每年9月30号香港建云旅行社出钱,其在京的团队以市侨联的名誉举办联欢会,演节目,抽奖品,提升了侨联的名声。1997年我

从侨联退休后,许多归侨、印尼华人都能和我保持联系。1990年,我和市侨联主席林其珍等人去印尼访问,见到了断交前的侨领,雅加达华侨总会(侨总)的老朋友郑年锦、余麦风、赖作仁等,恢复并建立了紧密联系。后来,郑年锦先生为市侨联困难户捐款30万人民币,成了市侨联基金会的第一桶金。

我在市侨联联络部工作期间,还带原驻印尼大使黄镇夫人朱霖同志,原驻印尼总领事李菊生夫妇、徐仁夫妇重游印尼;带余麦风先生到中南海见他叔叔;照顾原印尼移民厅赖先生在京的生活,并结识其子,至今保持联系;组织在印尼的巴中校友为奥运会水立方捐款,仅经我手的就有近15万美金。

退休之后,我除了担任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副会长以及接替巫乐华担任北京巴中校友会会长之外,还在侨务界,特别是国侨办离退休老侨的大力推举下,担任北京市老年协会(由中央和北京侨务界组成的退休老侨协会,后改名为北京市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会长。

北京巴中校友会的工作,除了联络在京校友,组织校友合唱团,关怀、互助、联谊之

外,还组织与境内外校友的联谊活动。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在昌平太阳城、华北大酒店等地点就曾经组织与印尼57届、58届、59届、60届等多届巴中校友一起在京联欢,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我们也组织北京校友到印尼参加巴中建校的大型纪念活动。2005年的巴中建校60周年北京有近100人参加,2015年70周年也有近50人参加。2012年和2013年还去香港参加那里的巴中校友会的活动。这些联谊活动联络了感情,增进了友谊,也发扬了“乐观,进取,合作,奉献”的校训,也增进了海外校友们对中国的了解。

2013年,我有机会认识了已故原福建省副省长、中国侨联副主席尤杨祖的长女尤木兰,她正在北京照顾残疾的弟弟。她弟弟残疾是先天的,不会说话,完全没有自理能力,需要人照顾,但至今没解决低保、残保问题。她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存款也越来越少。我帮助她向有关单位反映她的困难,呼吁解决她们的低保问题。

2008年我刚接手北京市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的工作后,在大家的建议和支持下,把该会仅有的捐款资